



丛书主编 金民卿

道路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DAOLU

ZHONGGUOTESEGEMINGDAOLUDEKAIPU

陈亚联◎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共和国起步

丛书主编 金民卿

道路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DAOLU

ZHONGGUOTESEGEMINGDAOLUDEKAIPI

陈亚联◎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 陈亚联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9

(共和国起步丛书 / 金民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718 - 2

I. 道… II. 陈… III. 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研究—
中国—1927 ~ 1935 IV. D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577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有限公司
照 排	腾鸢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718 - 2
定 价	30.00 元

总 序

共和国从红土地上起步

金民卿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自己的60华诞。在这个举国同庆时刻，人们抚今追昔，盛赞共和国今日之强大，追念共和国奋斗之历程。

当此之时，我们不禁把追忆回溯60年前的10月1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由此，我们又不禁再把追忆回溯到更加久远的1931年11月7日。还是伟人毛泽东，在红都瑞金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临时中央政府到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经历了18个春秋的艰苦

奋斗，中华民族又经历了18年岁月的风云变幻，但历史的连续性并没有割断。毕竟，瑞金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国都，人民共和国在江西的红土地上开始起步。

共和国的起步之旅，虽历经曲折与艰辛，但充满壮丽与辉煌。

大革命失败后，中华民族的大地上一片腥风血雨，无数革命先烈倒在血泊之中。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勇敢地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开始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三大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打破敌人多次“围剿”，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开始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时期。

当然，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踏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征途之际，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一系列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首当其冲。是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新旗帜，还是要继续举起国民党的旗帜？是照搬照抄俄国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还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出一条“以乡村为中心”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背得滚瓜烂熟的教条，坚持教条主义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俯首听命地依从来自远方的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独立自主根据中国具体特点来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空前镇压的同时，自身又处于极大的内在矛盾当中。

矛盾的存在注定了起步之旅的曲折与艰辛。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就有曲折，而正是矛盾、斗争和曲折当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上逐步走出了幼稚的窘境，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和成就。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曲折中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新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武装斗争新实践，实现了土地革命政策新创造，提出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新理论；反对以唯心主义为根源和实质的形式主义、本本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提出了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成果，并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把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推向深入、用于实践。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探索中开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时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基础。之后，把这个思想进一

步升华，到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正式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初步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毛泽东等把这个理论不断推向实践，从而实现了革命道路新理论向实践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在磨难中觉醒。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多次“围剿”，导致其生存条件极其艰辛。另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示不绝如缕，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探索之路。更为重要的是，党内连续出现了错误估量革命形势下的“左”倾盲动主义、革命高潮条件下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共产国际严重影响下的“左”倾教条主义，致使党的路线长期出现偏差，并极大地压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但是，也正是在这种磨难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越来越走向独立自主和觉醒。

中国工农红军在战争中壮大。八七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三大武装起义，开始创建新的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探索如何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条件下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的问题。不仅创立了一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红军，而且制定和提出了一整套红军的建军原则、制度和办法，形成了一整套红军建设思想：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确立红军的建军宗旨，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加强军队中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确保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性质；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外部关系，确立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等等。中国工农红军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中，战略战术不断升华，军队正规化建设不断发展，红军的总体力量不断壮大。

苏维埃共和国在斗争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大力推动苏维埃运动，开辟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尽管由于身处恶劣的战争环境，加上党的年轻幼稚、经验不足，苏维埃共和国步履维艰。但是，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辉煌的。尤其重要的是，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积累了历史借鉴和宝贵经验。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开辟，中国共产党的逐步觉醒，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壮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发展，都与江西这片红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理论，道路，党、政、军的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发展有着割不断的历史关联。在一定意义上说，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正是以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为雏形；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以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为雏形；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架构——政务院的组织体系，正是以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组织体系为雏形；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正是以苏

维埃共和国时期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建设模式为雏形。……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五位青年学者，在感念人民共和国60年辉煌成就的同时，把目光聚焦于江西这片红土地上，以揭示那个火热年代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以特殊的方式来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正因为方式的特殊，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力图做到如下几点：在创作思路上，力求做到把学术视角与通俗风格相结合，以大众化的形式展示理论性的思考；在文献使用上，力求做到把主要运用第一手资料同参考最新研究成果相结合，以第一手文献为主，用正史而不用野史，孤证存而不录，他人研究成果可作参考但主要依据自己研究成果；在合作方式上，力求做到把集体研究与个人负责相结合，在主编拟定初步写作框架和基本创作思路的前提下，每位作者独立创作成书并文责自负。

谨以此丛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

前 言

大文学家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正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走出来的。

曾几何时，面临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人悄悄掩埋同志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举起了正义的枪杆，毅然打出斧头镰刀的旗帜。暴动，暴动，还是暴动，在城市，在乡村，但最终都奔向进攻的目标——大城市和中心城市！

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相继失利。继续攻打中心城市，还是上山下湖，这是个问题，是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通向胜利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被逼“上山”的共产党人，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继而在赣南闽西地区摸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形式，逐步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沿着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一走就是 80 多个春秋。

什么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众所周知，近30年来最流行的词是“改革”，而在60年前最流行的词则是“革命”，它们都是代表当时时代的关键词。何谓“革命”？按毛泽东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而暴动是一门艺术，得讲究方法，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自鸦片战争以来，先后爆发的影响波及全国的革命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种以革命名义进行的“革命”。举的旗各不一样，走的路也各有特色，各领风骚。这些由不同阶级领导的革命，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最终的目标都是夺取旧统治阶级的统治中心——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太平天国运动，从乡村发动，然后直奔城市，一路攻城掠地，直至定都大城市，建立自己的政权。辛亥革命则在大城市不断刺杀、暴动，再刺杀、暴动，不断地扣击，终于打破清王朝这只本以裂缝重重的旧碗。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国的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久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开始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如同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一样，中国共产党接受的也是西方传播过来的思想理论，他们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吗？虽然历史早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回顾、对比近代以来中外发生的或成功或失败的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寻找它们成功或失败的答案。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在于共产党人选择了正确的理论，也在于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仅有正确的理论，没有正确的道路，革命也不会成功。中国革命没有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城市中心”的道路，也没有走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道路，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革命胜利后，取得

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一场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存在几千年的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那么，究竟该如何确定这条道路的内涵呢？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主要是区别于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或者城市武装起义，直接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模式和社会形态更替途径。它既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在首都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也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步到位，而是要分两步走；更不同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这一点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曾经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不同意见，甚至在共产国际那里也有争论。但很快取得一致意见：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指出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②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两重任务：“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③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实行革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方式方法既不同于马克思所构想的革命，也不同于传统的苏联式的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它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按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原则，通过合作化道路变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一阶段，而且是最重要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④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国情特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脱离中国现实。到底走什么道路？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可寻，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是标志性理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往很多人就把它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相混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既密不可分，又有明显的区别。区别在于范畴不同，理论层次不同，回答问题角度不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在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途径，也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必经之路。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二阶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过渡时期是融合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中，与其同步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它使毛泽东构想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二步得以顺利实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两重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⑤ 这就是毛泽东所构想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总体框架。那么，如何使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对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呢？毛泽东再一次超越了苏联在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创造新的社

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急骤变革模式。他把这场必然的社会变革变成了一种不流血的、和平的过渡，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渐变的桥梁，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顺利地实现了逐步过渡，使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⑥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怎样形成的？

由“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到“把农村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思想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表率作用。毛泽东对“把农村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转变的认识，是在近十年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明确的。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在“六大”的时候，“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农村为中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道路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以弱胜强的谋略主要表现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通过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我党在全国10多个省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建立了30万红军正规军，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了“星火燎原”的大好革命形势。但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指导，最终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多数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作了这样的表述：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加上国际有利条件的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至抗日战争后期，我党共在敌后开辟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达100万平方千米，人口近1亿，形成了依托根据地进行大反攻，收复和夺取城市的大好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谋略获得最后成功的时期。在战争准备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通过收缩江南兵力，依托华北解放区，创建东北根据地，使我党我军占据了最终战胜蒋介石、夺取中心城市的有利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依托解放区广大乡村，进行内线作战，并通过有目的地放弃一些城市，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战略进攻阶段，我军不仅依托广大解放区，而且挺进中原，在战略外线创建新根据地，首先夺取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尔后夺取敌占中心城市，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毛泽东于1930年1月写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断定他已初步确立了“以乡村为中心”，这一点也为学术界广泛认同。但是应该指出，任何一种理论的完全形成，都要经过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中

国革命道路理论也不例外。我们说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只是标志着中国革命理论的初步形成，是因为文章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该文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尚缺乏明显认识；尚未能概括“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等标志性概念。

这一理论的成熟，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6至1939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和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地认识到，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者是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并且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入了发展与成熟阶段。后来，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等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在争论中形成的。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还是放在城市？今天看来，是一个历史常识，但在当时，却是党内长期争论的关键问题。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里就这个问题曾感慨地说：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很显然，毛泽东这里说的“十几年来”主要指的是从1927到1945年。这18年里，“城市中心论”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总体上占统治地位，也是两条道路争论激烈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三次“左”倾错误思想坚持“城市中心论”，并以此来反对和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近年来有人提出，和邓小平一样，毛泽东一生也是“三落三起”。历史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仔细考察还会发现：毛泽东每一次“起”与“落”，都伴随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起伏。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特色”表现在哪里？

首先，表现在这场革命发生的地方不同于欧洲国家，这是在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的一场革命。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在很长时间内不赞成、不理解。早在1928年2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就错误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尽管当时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建立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但这些在他们看来，仅仅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而“革命运动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⑦因此他们强调，要用俄国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则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道路探索，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唯上”、“唯书”、“不唯实”、动辄照抄照搬国际经验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同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说：“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⑧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那种不顾各国实情而发号施令、瞎指挥的作风进行了严正的批评。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盲从，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可见，坚持独立自主，不盲目照搬别国经验，这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一个鲜明特点。